

国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拉斯诺谢科夫便是犹太裔孟什维克，这给了霍多罗夫极大的信心。

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交流，同年6月20日，霍多罗夫从上海赶到北京，正式当上远东共和国远东通讯社驻中国首席记者，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远东共和国驻华全权代表。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时刻，远东共和国政府颁布法令，凡是它没有派驻大使和领事的国外地区，均由远东通讯社驻当地记者行使领事职能，所以“远东通讯社驻华全权代表”霍多罗夫斯基自动成为远东共和国驻中国首任领事，也可以说他是苏俄派驻中国甚至远东的第一位特命全权外交官。

别看名头很大，历史地位显赫，可当年远东共和国实在穷得叮当响，除了从游击队改编成的人民革命军外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远东通讯社驻华记者站更是只有霍多罗夫唱独脚戏，工作开展得如何，全看个人本事了。令人赞叹的是，记者兼“领事”霍多罗夫不负重托，他长袖善舞，风风火火地开展起外交和新闻活动，他只靠稿费就能到处旅行，与中国官员和西方外交官会面，宣传苏俄的和平主张，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至少能消除一些对苏俄和共产主义的偏见。除此之外，他还亲自为苏俄地下党务工作者签发远东通讯社的记者证明，让他们以新闻人员身份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俄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明确证实，1920年12月，霍多罗夫亲自把来自苏俄的两万美元资金交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教授，用于在中国宣传共产主

右图：
（左）霍多罗夫的著作《争取独立的中国》。
（右）上海生活出版社1922年出版霍多罗夫《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



义思想。

1920年秋，远东共和国首批官方使节终于抵达北京，霍多罗夫便成了他们的总顾问和“灰衣主教”。他把外交官们安置到市中心的六国饭店，租赁第一间办公室，还领着他们找裁缝缝制外交官燕尾服。考虑到这些外交人员过去是些游击队员，不懂得外交礼仪，霍多罗夫还要求他们苦读美国律师约翰·摩尔的四卷本著作《国际法摘要》。40多年后，首批外交官之一马克·卡扎宁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段往事，“正是在霍多罗夫牵线搭桥之下，我们才与中国官员和美国外交官建立起联系。当时，苏俄比较孱弱，日本在远东的横行霸道也令美国人愤怒，而中国公开表达日本借侵略西伯利亚之机一并吞并满洲（中国东北）的担忧，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非常巧妙地利用日美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一号公敌’日本。”直到今天，俄外交部档案里依然不吝词藻地称赞霍多罗夫在北京、上海发展了深厚的外交圈人脉，再加上通晓英语、中文，为苏俄争取了宝贵的国际同情和声援。

中国著述深受列宁重视

除了紧张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外，霍多罗夫从不忘自己的新闻记者本色。他以远东通讯社的俄文缩写“Dalta”的谐音“Delta”为笔名，不断在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媒体上发表文章，强调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终将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那里将爆发“撼人心魄的伟大革命”。他曾把《正在获得解放的中国》一书底稿寄给苏联第二任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齐切林（第一任是托洛茨基），并立即拿到俄共（布）中央传阅，首先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称赞是“极富价值的革命研究著作”。

1922年，霍多罗夫所著的《正在获得解放的中国》的姊妹篇——《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十月革命后在远东出现的首部俄文社会学著作。虽然书名听起来非常严肃，里面的内容也完全属于科学范畴，但其中也不乏观察力非常细致的记者描写，甚至造就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名词，例如苏联（俄罗斯）汉学